

# 深度贫困区旅游扶贫绩效感知差异分析

## ——基于渝东北 639 户农户调查数据

管陈雷 童洪志 于开红<sup>1</sup>

**【摘要】:**立足多维贫困视角,以渝东北为研究区域,运用因子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量化深度贫困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等级,同时结合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非贫困户和贫困户的感知差异。研究发现:渝东北地区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介于“一般”与“满意”之间,不同类型农户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思想文化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根据村级尺度多维贫困综合测度和感知差异比较分析结果,提出加大政策扶持、提高政府宣传力度、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能力、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旅游 深度贫困区 渝东北 旅游扶贫 感知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20)07-0123-08

###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sup>[1]</sup>。为进一步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改善贫困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工作经验之上,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为乡村发展指明的前行道路<sup>[2]</sup>。中国乡村旅游是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主导和引领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是改善贫困的重要手段,也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实现乡村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sup>[3]</sup>。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业作为扶贫(反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一直都受到国内外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随着旅游业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作用日渐突出,旅游扶贫相关内容也随之增多。国际上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扶贫理论解析<sup>[4]</sup>、政策<sup>[5]</sup>、方式<sup>[6]</sup>、效果<sup>[7]</sup>、利益相关者态度<sup>[8]</sup>、社区参与<sup>[9]</sup>等方面,理论研究较为成熟,定量研究方法多样,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内容,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有待深入<sup>[10]</sup>。国内旅游扶贫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开发模式与实施路径<sup>[11]</sup>、效应<sup>[12]</sup>、精准扶贫<sup>[13]</sup>、满意度与利益相关者<sup>[14,15]</sup>、居民参与意愿与感知<sup>[16]</sup>等方面。

在中国,贫困地区多与旅游资源富集区有很大的空间重叠性,尤其在中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与贫困耦合关系更为紧密,旅游业发展潜力更大。贫困地区农业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传统产业发展潜力不足、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严重限制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增长<sup>[17,18]</sup>,使得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空间上呈现出集中连片的状况。贫困村既是一个基本地理单位,也是微观研究的最小空间尺度,我国乡村旅游扶贫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模式和路径的探讨,而关于不同类型居民感知差异的专题性研究相对

<sup>1</sup>**作者简介:**管陈雷,重庆三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旅游者体验;童洪志(通信作者),重庆三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扶贫和乡村旅游;于开红,重庆三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与乡村环境治理(重庆4041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中国生态贫困问题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BJL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多主体参与的深度贫困区精准脱贫联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YJC630156);重庆三峡学院青年项目“大数据背景下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QN16);重庆三峡学院新型消费与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研究项目“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文旅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9GSXYXS07)。

不足，在微观经济中并没有瞄准西部山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缺乏定量实证研究和人类学分析。社区参与是实现旅游扶贫的核心话题，如何基于社区居民感知，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能力，合理评价乡村旅游扶贫绩效是主要研究内容。相关研究在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且缺乏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的感知差异。

基于此，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考察渝东北深度贫困区为重点，结合多维贫困理论及其相应评价指标，构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旅游扶贫绩效进行等级评价，并根据居民对不同指标的感知得分，结合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类型居民对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的感知差异，以期为深化乡村旅游扶贫的理论研究、科学量化乡村旅游扶贫绩效、提高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 二、研究区域与数据

### （一）研究区概况

渝东北地区地处渝、鄂、川、陕四省市交界地带，包括万州、丰都、垫江、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等 11 个区县，面积共 33900Km<sup>2</sup>。该区域既是重庆市重要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又是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虽然，自然资源禀赋条件较好，可开发的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性与同质性现象较为突出，喀斯特地貌面积分布较广。同时，该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发展条件较差，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是重庆市脱贫攻坚重点关注区域。

### （二）数据来源

在调研期间（2019 年 4 月至 7 月），课题组考察了研究区村情、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人数、农户主要生计来源、经济作物种类以及居民参与旅游形式等情况<sup>[19]</sup>，尤其重点关注巫溪、城口、巫山、奉节、云阳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共向社区居民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39 份，利用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得到问卷调查样本统计信息（表 1）。从表 1 可知，调查样本基本特征主要包括：（1）从乡村旅游参与度来看，参与旅游的居民比未参与的多 2 倍以上，反映出渝东北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被大部分居民感知，部分居民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当地旅游的发展和建设；（2）从文化程度来看，90%以上的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都在高中或中专以下，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3）从家庭月收入来看，低于 4000 元的比重达 71.05%，家庭月收入水平普遍较低。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社会属性特征		占比 (%)	社会属性特征		占比 (%)
家庭类型	非贫困户	55.39	年龄	25 岁以下	0.84
	建卡贫困户	44.61		25-45 岁	28.03
参与旅游	是	71.55		46-65 岁	50.63
	否	28.45		65 岁以上	20.50
性别	男	55.65	家庭总人数	3 人及以下	25.52
	女	44.35		4 人	37.2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8.54		5 人	28.03
	初中	28.45		6 人以上	9.21
	高中或中专	18.41	家庭月收入 (元)	2000 以下	33.05
	大专	2.93		2001-4000	41.00
本科	1.67	4001-6000		20.50	
硕士及以上	0.00	6000 以上		5.45	

###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因子分析法、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单因素方差分析：（1）因子分析法是从研究变量内部相关的依赖出发，对于复杂的系统问题，用最少数目的不可预测的所谓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的观测变量<sup>[20]</sup>；（2）模糊数学主要是用于处理模糊信息的一种数学方法，以揭示模糊现象的本质和应有的规律<sup>[21]</sup>，通过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先确定评价要素集合，再根据评价决策的实际需要划分评价等级，之后确定评价要素权重，最终计算得出评价等级；（3）单因素方差分析用于检验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感知的主要因子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对显著性检验结果进行深度分析。根据调查对象的家庭类型和参与旅游情况，将社区居民分为 4 类：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建卡贫困户和未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建卡贫困户。

## 三、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量表指标的选择与维度构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通过梳理旅游扶贫、扶贫绩效以及社区居民旅游感知的相关文献，结合社会交换理论<sup>[22]</sup>和社区参与理论<sup>[23]</sup>，提取比较成熟的测量指标。例如：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增多居民就业机会、提高本地知名度、改善居民间的人际关系、增强居民生态保护意识等。

其次，在贫困人口识别方面，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瞄准贫困人口，除了收入确定的贫困线之外，诸多学者主要倾向于从多维贫困的角度评估贫困发生率，进而提出影响贫困的多维因素<sup>[24]</sup>。旅游扶贫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扶贫，还应当包括教育文化、道德素养、健康、住房等方面的扶贫<sup>[25]</sup>，基于此，本文选择了提升教育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增多人均公共设施面积、增多居民休闲健身机会、增多当地居民谋生技能等评价指标。

最后，通过前期对研究区居民半结构式访谈，从渝东北深度贫困区实际情况，提出改善当地村容村貌、吸引更多投资者、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多贫困者参与旅游机会等评价指标。综上，从经济效益、社会文化效益、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共遴选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 43 个，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见下图）。

### （二）评价指标体系因子分析

为降低 43 个评价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同时删除相关性较低的评价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将以上评价指标按李克特 5 分量表设计问卷，并按 1~5 进行打分，1 代表“极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一般”、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通过向案例地社区居民发放问卷，收集和整理基础数据。利用 SPSS19.0 软件分析得出整体评价指标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4，且 KMO 值为 0.81，信度与效度检验值均大于 0.80，反映出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并适合作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估计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关键因子，计算累计贡献率，结合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分析，共提取出 9 个主因子，涵盖 36 个评价指标，剔除了游客量增多、加强与外界交流、减少社会矛盾、增加当地犯罪活动等 7 个评价指标（表 2）。9 个主因子囊括了乡村旅游扶贫的经济、生态、社会、思想文化、生活条件等多个维度，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68.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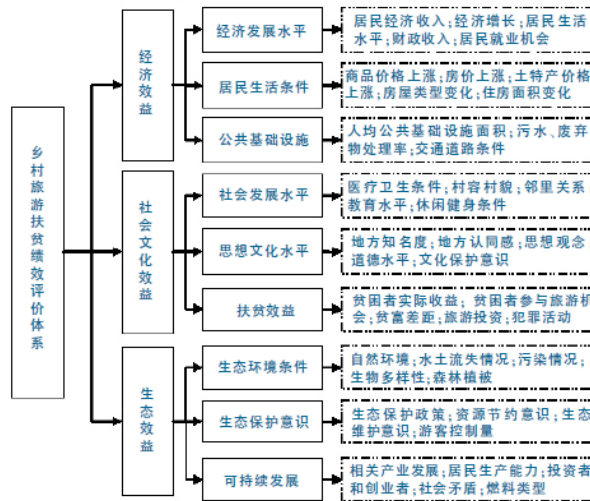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

## 四、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

### (一) 乡村旅游扶贫绩效模糊综合评价

基于上述因子分析发现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具有多维性，提炼出的 9 个主因子也不能完全涵盖问卷设计的所有评价指标。加之部分居民在填写问卷过程中，对专业名词不明确和不重视，会使得心理感知与实际效益存在模糊差异。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运用模糊变换原理分析和评价模糊系统的方法，它是一种以模糊推理为主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精确与非精确相统一的分析判别方法。通过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能科学地定量评价渝东北深度贫困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

首先，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将 9 个主因子及其评价指标构成评价因素集合  $T=(T_1, T_2, \dots, T_n)$ ，同时，将社区居民对当地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的评价指标，构建成两层评价指标集；其次，将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糊集分为 5 个等级，即  $V=(V_1, V_2, V_3, V_4, V_5) = (\text{好}, \text{较好}, \text{一般}, \text{较差}, \text{差})$ ，并分别对应赋值为 5、4、3、2、1；再次，基于因子分析所得到的因子载荷，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为  $T=(0.279, 0.077, 0.063, 0.117, 0.112, 0.072, 0.147, 0.080, 0.053)$ ；最后，采用普通矩阵乘法，经过合成运算得到案例地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的综合评价结果为 3.647。参考评价等级划分情况，可知渝东北深度贫困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结果介于“一般”到“较好”之间，乡村旅游扶贫初具成效，有待继续提升。

### (二) 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感知差异

社区居民感知是旅游扶贫实际绩效程度的重要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旅游扶贫的意向。为定量检验不同类型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的显著性差异，基于上述对社区居民类型的划分和提取的旅游扶贫绩效 9 个主因子，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的最小显著性法 (LSD) 得到多重比较方差检验结果，并保留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各项结果。

从整体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渝东北深度贫困区 4 种类型居民均对生态环境条件 (T7) 和公共基础设施 (T3) 两个主因子的绩效感知没有显著性差异。目前，乡村旅游发展仍处于起步和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破坏现象并不明显，加之居民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充满热情和期望，十分重视提高自身参与旅游的机会，故对发展乡村旅游所带来的负面感知较低，认识也相对不足。在实地考察和访谈中发现，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确实改善了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交通条件、污水废弃物处理等多个方面，健全了公共基础设施条件。因此，在评价这两个主因子中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表 2 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因子分析

评价指标	因子载荷	特征值	贡献率/%	Cronbach's $\alpha$	均值	标准差
经济发展水平(T1)		7.619	19.222	5.175		
1. 增加居民经济收入(T11)	5.156				4.551	1.421
2.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T12)	5.711				3.116	1.432
3. 增加居民就业机会(T13)	5.612				3.929	1.361
4. 促进当地经济增长(T14)	5.671				4.159	1.576
5. 增加财政收入(T15)	5.626				3.117	1.354
居民生活条件(T2)		2.127	5.317	5.731		
6. 房价上涨(T21)	5.751				2.951	1.162
7. 生活商品价格上涨(T22)	5.731				3.531	1.751
1. 土特产价格上涨(T23)	5.616				3.215	1.746
公共基础设施(T3)		1.436	4.345	5.726		
9. 增多人均公共设施面积(T31)	5.141				3.699	1.562
15. 污水、废弃物处理等设施(T32)	5.151				3.745	1.419
11. 改善交通道路条件(T33)	5.791				3.151	1.452
社会发展水平(T4)		3.551	1.514	5.161		
12.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T41)	5.767				3.741	1.526
13. 改善村容村貌(T42)	5.731				3.174	1.511
14. 提升教育水平(T43)	5.667				3.112	1.475
15. 改善邻里关系(T44)	5.645				3.523	1.627
16. 增多休闲健身条件(T45)	5.615				3.757	1.594
思想文化水平(T5)		3.514	7.619	5.761		
17. 提高知名度(T51)	5.141				4.546	5.961
11. 促进居民思想观念进步(T52)	5.121				3.937	1.541
19. 提高居民道德水平(T53)	5.151				3.766	1.553
25. 增强地方认同感(T54)	5.717				4.529	1.424
21 当地文化保护意识(T55)	5.692				3.657	1.561
扶贫效益(T6)		1.979	4.941	5.156		
22. 增多贫困者实际收益(T61)	5.141				3.916	1.526
23. 增多贫困者参与旅游机会(T62)	5.124				3.154	1.265
24. 缩小贫富差距(T63)	5.156				3.649	1.364
生态环境条件(T7)		4.545	15.599	5.126		
25. 改善生态自然环境(T71)	5.111				3.749	1.421
26. 减少水污染、空气污染等(T72)	5.755				3.577	1.346
27. 减少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等(T73)	5.729				3.495	1.332
21. 保护生物多样性(T74)	5.757				3.411	1.361
29. 保护森林植被(T75)	5.621				3.64	1.367
生态保护意识(T1)		2.195	5.416	5.131		
35. 增多生态保护政策(T11)	5.133				3.719	1.442
31. 增强居民资源节约意识(T12)	5.764				3.712	1.365

32. 增强居民生态维护意识 (T13)	5.755				3.121	1.653
可持续发展 (T9)		1.251	3.654	5.745		
33.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T91)	5.151				3.916	1.471
34. 增多投资者和创业者 (T92)	5.773				3.669	1.615
35. 提高居民生产能力 (T93)	5.665				3.616	1.761
36. 优化燃料类型 (T94)	0.631				3.621	1.575

注：累计方差贡献率=68.839%,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3358.572 (df=780, sig<0.001)。

从农户具体感知差异来看：（1）在经济发展水平（T1）方面，参与旅游的农户与未参与旅游的农户存在显著性差异，而未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和贫困户之间并未存在显著性差异。（2）在社会发展水平（T4）方面，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未参与旅游的农户存在显著性差异。（3）在思想文化水平（T5）方面，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未参与旅游的农户对该评价因子也未有显著差异。可见，地方发展乡村旅游业对先锋农户和积极参与旅游的贫困户是具有积极效应的，而未参与旅游的农户，对其乡村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感知不明显。（4）在生态保护意识（T8）方面，参与未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参与旅游的贫困户与未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之间也没有显著性。（5）在居民生活条件（T2）方面，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未参与旅游农户存在显著性。（6）在扶贫效益（T6）和可持续发展（T9）方面，参与旅游的农户与未参与旅游农户存在显著性，而未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综上所述，不同农户类型以及其参与旅游的不同程度会直接影响旅游扶贫绩效的感知差异。由于社区居民经济收入水平不一、受教育程度不同、生计能力差异、参与旅游意愿、距离景区远近和交通条件等因素，使得其参与旅游能力以及参与旅游方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在乡村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多方面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 （一）结论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模糊综合评价、均值比较等方法，综合测评了深度贫困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和居民感知差异，主要有以下发现：

1. 旅游扶贫是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生活条件，提高居民个人收入，而且对当地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助力作用。

2. 社区居民除了对经济发展水平感知强烈外，对当地社会发展水平、思想道德素养、公共基础条件等方面也有较强的感知。深度贫困区主要依托景区和新开发的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为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营造了很好的氛围。同时，也带动了部分居民积极主动参与旅游业的发展建设，增强了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的多方面感知。

3. 渝东北深度贫困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介于“一般”与“满意”之间，不同类型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在多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4. 不同类型居民均对生态环境条件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绩效感知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思想文化水平和生态保护意识等绩效感知上存在异同。参与旅游的农户与未参与旅游的农户，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思

---

想文化水平、生态保护意识、旅游扶贫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与建卡贫困户在社会发展水平、思想文化水平和生态保护意识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未参与旅游的非贫困户与建卡贫困户在经济发展水平、扶贫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二）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差异的分析，为进一步提高当地旅游扶贫绩效，提升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满意度，改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科学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1. 加大政策扶持和政府宣传力度，做好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后期保障工作。

渝东北深度贫困区建卡贫困户致贫原因具有多样性，其中主要包括因病致贫、因劳动力致贫、因残致贫和因学致贫等因素。同时，贫困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导致部分居民对扶贫政策和未来乡村发展的知晓度较低。乡村旅游扶贫能改善贫困户短期内的经济条件，但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仍需持续关注。因此，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扶持和技能培训尤为重要，对于无劳动能力的建卡贫困户，政府可采用现金帮扶、物资赠送、土地入股、社区分红等帮扶手段改善和保障其基本生活条件。

### 2.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能力，协调相关利益者关系。

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服务的主要接待者，增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动力和能力，能加大社区居民的自豪感、满足感和参与感。研究区应结合社区居民条件，从不同层次提高居民参与旅游机会，提高不同类型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的感知。如：距离景区和交通道较近的居民，可以开办农家乐、餐馆、小卖部等能直接为游客服务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距离景区较远、经济条件相对较差、能力不足的居民，可通过到景区务工、餐馆打工、种植大面积蔬菜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乡村旅游。同时，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合理协调相关利益者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影响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 3. 合理进行旅游开发，保护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

渝东北深度贫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森林植被覆盖率高，垂直地带性景观丰富多样。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条件，通过合理规划开发，使区域生态环境能够实现“绿水青山”的发展目标。土地作为农户生存和生计的依托资源和保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根据居民意愿进行占地、租地、购地等形式的用地行为，不可强买强卖，而应尽量满足居民用地要求，减少用地纠纷，保障居民生活用地需求。

## 参考文献：

[1]刘彦随.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

[2]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4).

[3]李志龙.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

[4]Blake A, Arbache J S, Sinclair M T, et al. Tourism and poverty relief[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1): 107-126.

- 
- [5]Regina Scheyvens, Janet H. Momsen.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Issues for Small Island States[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8, 10(1):22-41.
- [6]Torres R, Momsen J H.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for Linking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to Achieve Pro-poor Tourism Objectives[J].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4, 4(4):294-318.
- [7]Christian M. Rogerson.. Tourism-agriculture Linkages in Rural South Africa:Evidence from the Accommodation Secto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 20(3):477-495.
- [8]Aref F..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mpacts:a Case Study of Shiraz, Iran[J]. Tourism Analysis, 2010, 15(2):253-261.
- [9]Tosun C.. Expected Natur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3):493-504.
- [10]程承坪, 邹迪. 新中国 70 年扶贫历程、特色、意义与挑战[J]. 当代经济管理, 2019, (9).
- [11]崔丹, 吴昊, 刘宏红, 等. 大都市区贫困带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与路径探析——以环京津贫困带 2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9, (7).
- [12]杨德进, 白长虹. 我国旅游扶贫生态效率的提升路径[J]. 旅游学刊, 2016, (9).
- [13]陈瑾.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创新路径: 江西实证研究[J]. 企业经济, 2019, (10).
- [14]李瑞, 吴殿廷, 殷红梅, 等.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J]. 地理学报, 2016, (8).
- [15]鄢慧丽, 余军, 熊浩, 等.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利益相关者网络关系研究[J]. 软科学, 2019, (3).
- [16]卢冲, 耿宝江, 庄天慧, 等. 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研究——基于四川藏区 23 县(市)1320 户的调查[J]. 旅游学刊, 2017, (1).
- [17]黄震方, 陆林, 苏勤, 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 地理研究, 2015, (8).
- [18]马忠玉. 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旅游开发与贫困消除[J]. 自然资源学报, 2001, (2).
- [19]童洪志. 渝东北贫困地区深度扶贫“四方联动”模式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8).
- [20]徐建华. 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21]张辉, 高德利. 基于模糊数学和灰色理论的多层次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8, (3).
- [22]王咏, 陆林.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J]. 地理学报,

---

2014, (10).

[23]郭迪, 鲁小波, 丁玉娟. 近十年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综述[J]. 世界地理研究, 2015, (2).

[24]王小林, Sabina Alkire.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估计和政策含义[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2).

[25]杨慧敏, 罗庆, 李小建, 等.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 3 个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10).